

以新思維促北都建設 以新發展護國家安全

——香港首份五年規劃與北部都會區的戰略使命



方 丹

安全是發展的前提，發展是安全的保障，這一辯證關係是國家治理與區域發展的核心邏輯。夏寶龍主任在2026年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致辭中指出，「有安全才有發展，沒有安全一切皆無從談起」。這一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安全與發展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內在聯繫。國安法的實施和選舉制度的完善，不僅使得社會恢復安寧，更為經濟高質量發展與民生持續改善奠定了堅定基礎。

在香港邁向由治及興的關鍵發展階段，謀發展、促轉型、強根基，迫切需要一個能夠統攬全局、指引長遠、銜接國家戰略的核心戰略工具。香港特別行政區正在編制的首份五年規劃，正是這一戰略工具的核心載體。這份規劃不僅是特區政府施政履職的「任務清單」與「行動綱領」，更是香港治理體系現代化、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里程碑，其戰略意義遠超規劃文本本身，集中體現為兩個層面突破：

形成「謀全局、謀長遠」的戰略思維

其一，五年規劃編制的核心價值，在於推動香港管治者實現戰略思維的系統性提升。雖然香港已經不再用「積極不干涉」的口號，但在實際工作中還是更多著眼於短期的行政事務，缺乏在國家戰略與全球競爭格局下對香港的定位和長遠謀劃。通過五年規劃的制定，治理者將跳出「頭痛醫頭」的局限，去思考未來五年的產業結構、空間布局與人口政策，從「低頭看路」到「抬頭望遠」，逐漸形成「謀全局、謀長遠」的戰略思維，這比規劃文本本身更具深遠價值。

其二，五年規劃的深層意義，在於推動香港主動對接國家整體戰略規劃，深度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核心使命，正是要解答一個關鍵命題：在國家發展的大棋局中，香港究竟該落子何處？從提升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建設國際創科中心，到發展北部都會區，都要基於國家大戰略下來思考定位。通過主動對接，香港不再是孤立的都市，而是國家戰略的深度參與者與貢獻者。

北部都會區建設作為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重中之重，其戰略價值遠超普通的土地開發項目，而是對香港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影響的戰略布局，其核心意義集中體現在三個維度，構成香港未來發展的戰略支撐。

第一，北部都會區是香港深度嵌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關鍵，也是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裏，無論是跨境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還是創新科技產業鏈的協同布局，抑或是資金、數據、人才等生產要素的便利流動，都將得到物理空間與制度創新的雙重支持。

第二，北部都會區是香港培育新產業的最重要載體，也是服務國家科技戰略的最佳平台。「十五五」規劃強調國家的經濟發展須以科技創新為核心驅動力，須確保科技產業鏈的核心技術和關鍵環節自主可控。

這是當前國家投入最大的領域。香港要搭上國家發展的快車，必須以國家重點推動或有重大需求的關鍵產業環節為出發點，再檢視香港自身的條件可以如何為國家科技發展戰略作出貢獻。作為香港唯一的大面積可發展空間，無論是吸引企業發展產業，還是集聚力人才開展科研創新，都將由北部都會區擔當重任。在「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下，通過產業和居住空間的拓展，吸引和容納更多國際高端科技產業和人才來到香港，服務國家科技自立自強戰略，就是發展北部都會區的第二重意義。

第三，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將改變和優化香港過去百多年來的空間發展布局。一直以來，香港主要經濟功能和就業機會都集中在維多利亞港兩岸的狹長地帶，與內地相鄰的新界被視為城市發展的邊陲和鄉郊地帶，長期未得到充分開發利用，區域的生產生活功能落後。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將有助於香港平衡經濟功能的空間布局，改變以維多利亞港兩岸為中心的單核城市格局，形成「南金融、北創科」的雙核格局，推動經濟產業結構多元化，改善社會的向上流動性，令香港居民充分共享發展成果。

從「學研產」向「產學研」模式轉變

夏主任致辭有關如何建設北部都會區的論述，雖然只有短短的約50個字，但卻指出了三個最關鍵的着力點：一是要推動產學研協同，二是要實現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三是要注重項目支撐，培育發展新平台、新動能。這三個方面既是北部都會區建設的核心任務，也是決定其建設成敗的關鍵，直接關係到北部都會區能否承擔起國家賦予的戰略平台使命。

第一，以北部都會區為抓手，推動香港創科模式從「學研產」向「產學研」轉型，破解創科成果轉化難題。

長期以來，香港創科生態體系不完備，創科產業的上游雖具備較強的高校科研能力，但下游缺乏規模化的創科產業支撐。香港的研發（R&D）投入雖然近年有顯著增長，但仍明顯低於周邊城市和其他發達經濟體的水平。但更重要的是，在研發投入的來源構成中，香港主要依賴政府資金，其佔比從2017年的46%升至近年的55%以上，而工商機構投入佔比則從50%降至40%左右。這與其他地方形成強烈反差：美、日企業研發投入佔比近80%，德、法超65%，內地2025年企業投入佔比達75%以上，深圳更是達到93.3%。

換言之，當前香港的創科模式本質上是「學一研一產」路徑，即政府資金主要投向高校，希望依靠大學教授及其團隊來推動的學術研究成果商業化。該模式面臨的核心挑戰是很難跨越「死亡之谷」（Valley of Death）。從科技創新的啟動階段（基礎研究或理論創新）開始，邁向科技成果成功轉化為商品的過程中，大量的項目會在從1到N的「死亡之谷」階段失敗。失敗風險極高，且成本多由政府承擔。因此，香港下一階段的重點，就是要利用北部都會區的機會，吸引大型龍頭科技企業落戶香港設立大型研發中心，以企

業的市場需求來推動研發活動，並和大學的研究建立有機聯繫，推動香港從「學研產」向「產學研」模式轉變。

以香港科技大學為例，其在香港清水灣的本部校區，研發經費幾乎全部來自政府撥款，即內地所講的「縱向經費」。而設立在廣州南沙的新校區，則接到很多企業委託的、以解決企業實際技術問題為目標的研究項目，即「橫向經費」，大大提升了應用研究的市場化導向。

第二，以北部都會區為平台，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北部都會區除了布局河套、新田等創科產業園之外，也規劃了大學城等空間，意圖發展教育樞紐。但最關鍵的是教育和科技能否形成一體化的機制，並以此為平台成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的高地。

當前在教育、科技、人才這三方面，香港也存在割裂的問題。在管理體系上，三者分屬教育局、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和勞工及福利局管理，工作協同程度和政策取向一致性會受到影響。未來要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融合發展，需要處理好兩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教育樞紐不能停留在做「學店」。目前香港各界都意識到教育產業化的發展潛力和利潤空間，甚至地產行業也因此受惠，但香港打造國際專上教育樞紐不能停留在這個層面，而是需要與國家和香港的創科產業戰略配合，服務包括人工智能、晶片設計、生物醫藥、量子技術、新材料、新能源等未來產業的發展。這就意味着，未來香港北都大學城的學科設置需要有意識地向這些科技產業傾斜，同時要與布局在北部都會區產業園的各類科技企業聯動，依託企業的需求推動學科的發展和資源的配置。

另一方面，未來香港在設計人才政策時，需要與自身重點發展的產業結合，尤其是關注建設國際創科中心所需要的人才。比如，創科局提出了2030年將製造業佔GDP由2020年1%提升至5%的目標。在缺乏基礎的情況下想實現這一目標離不開「新型工業化」模式，而「新型工業化」就需要吸引海內外的大型科技企業到香港設立研發中心，令香港參與中試和高端製造環節。但香港現時本地的人才結構並不能匹配這個需求。

雖然目前有所謂「科技人才入境計劃」，但其規模過小。如果香港要吸引大量科技企業入駐，那現有的人才計劃必須有所創新，未來應形成以企業為申請者，以工作為本的重點產業人才引進計劃。同時，還需要完善專業技能人才的引進。這些專業技能人才可能並非高端人才，但在其領域內有專長，如果又是現在香港行業所急需的，那就應考慮引進。

與此同時，要配合國家建設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就需要更多從產業發力吸引人才。近年美國打壓華裔科學家時，香港曾推出20億元的「傑出創科學人計劃」，設置100個名額專門吸收從海外歸來的學者。但因香港各大學的教授職位有限，這種模式難以大規模推廣，而且引進的也是學術領域人才。未來需更注

重大規模引進產業人才，通過優先引進龍頭科技企業落戶，再依靠落戶企業吸引海外高端人才來港。只有綜合優化教育、產業、人才等政策，才能實現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

打造融入服務國家大局最佳平台

第三，以重點項目為支撐，建設新型產業園區，提升北部都會區產業承載能力。在北部都會區的特定片區建立以服務新質生產力為目標的新型產業園區，是解決當前北部都會區開發面臨的挑戰和加快北部都會區發展的有效手段。長期以來，香港擅長土地規劃，但缺乏產業顧問的經驗，二者雖同屬「規劃」範疇，卻有着本質區別：土地規劃側重空間布局與指標落實，而產業規劃的核心是行動落地，本質上是一份推動產業發展的行動方案，關鍵在於招商引資與產業培育。

做好產業規劃、實現招商引資突破，需把握三個關鍵環節。

一是明確產業發展的細分方向，立足協同發展定位。這個方向不是簡單的產業大方向，而是要在產業大方向下，明確各個產業鏈中吸引哪些具體環節落戶香港，落實到細分領域。可以針對每個不同行業成立一個行業顧問團。通過政府與企業家顧問團的共同研究，在香港現時的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數據科學、先進製造與新能源科技等幾個大方向下，明確其中吸引到香港落地的細分環節。在選擇細分環節時，也需充分考慮與大灣區內地城市的產業鏈協同配合。

二是開展定向招商引資，聚焦頭部企業，強化核心產業集聚。應該針對性選擇目標企業，重點聚焦領域內的頭部企業，由專門招商團隊主動出擊，一家一家去叩門，爭取他們到香港落戶。而且在與引企企業商談中，需明確在香港發展的產業鏈環節，鼓勵企業將真正核心的高附加值業務放在香港進行，而不是僅僅來香港開個辦公室而已。為了激勵這些企業來港發展，政府也有必要創新性地給予多類型的優惠政策。

三是完善全流程服務配套，推行「一企一策」模式，提升招商引資質效。在這方面，尤其需要創科局和發展局的協同配合，因為產業政策和土地資源密不可分，離不開兩個局的密切配合。如果涉及到補貼、稅率等財務方面的政策，未來也需要更高層級的積極統籌。建議香港圍繞目標招引的重點企業，為每個企業都成立一個專門的全流程跨部門服務小組，成員由發展局、創科局、商經局及其他相關部門組成。這個小組負責從招引對應企業到企業落地投產運營的全過程服務，協助企業處理廠房地、人才招引、配套住宿等一系列問題。

通過以上措施，相信將有助於香港把握北部都會區建設機遇，構建全新的創科生態，既為香港自身發展培育新動能，也為香港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提供最佳平台，讓香港在發展與安全互相促進的道路上闊步前進。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香港傳統優勢的內涵重塑與能級躍升路徑



文雅靖

對香港而言，所謂傳統優勢，並不是過時產業、守成產業，更不是可以自然延續的歷史紅利，而是在長期國際競爭中形成、在「一國兩制」制度安排下沉澱、在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格局中仍具有不可替代價值的競爭核心競爭力。國際金融、國際貿易、國際航運、國際航空、專業服務、旅遊會展等優勢領域，共同構成香港參與國際循環、連接內地與世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基本盤。面對全球經濟格局深度調整、區域競爭日益加劇、產業形態加快重塑，香港鞏固提升傳統優勢，其關鍵就在於推動傳統優勢實現功能再造、結構升級和能級躍升。

一、進一步鞏固提升金融優勢，加快從「融資通道」向國家金融開放、金融安全和產業升級戰略平台的轉型

金融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傳統優勢，也是香港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支撐。總體看，香港金融中心基本盤穩固，優勢正在進一步鞏固提升。2026年3月發布的第3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顯示，香港總評分升至765分，繼續位居全球第三、亞太第一，與紐約、倫敦的分差分別只有2分和1分。資本市場方面，2025年香港資本市場重回全球IPO集資額榜首，全年集資374億美元，創2021年以來新高，並超過此前三年總和。年內，港交所共有119宗新上市，較2024年增加68%。財富管理方面，香港管理資產總值按年增長13%，達到35萬億港元；其中，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管理資產總值按年增長15%，錄得3840億港元淨資金流入。離岸人民幣方面，香港繼續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處理約全球80%的離岸人民幣支付款額。

以上事實表明，香港金融功能正在由傳統融資平台，向資本配置、財富管理、風險管理、人民幣業務和金融科技等多功能平台拓展。面向「十五五」，香港應進一步把金融優勢放到國家金融開放、金融安全和產業升級大局中謀劃。一方面，繼續發揮連接全球資本和內地資產的獨特作用，支持更多內地科技企業、先進製造企業、專精特新企業和出海企業在港融資、發債、併購和設立財資中心。另一方面，圍繞人民幣國際化和國家金融安全需要，做強離岸人民幣債券、

人民幣資產配置、跨境財富管理、保險再保險、基礎設施融資等功能，加快從「融資通道」向國家金融開放、金融安全和產業升級戰略平台的轉型。

二、進一步鞏固提升航運航空優勢，加快實現從增加「貨物流量」向「供應鏈控制力」提升

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建設挑戰與機遇並存。一方面，香港集裝箱吞吐量不斷被超越，其中新加坡和上海對香港形成全面競爭。此外，越來越多的國際製造商把供應鏈從中國內地遷往或擴展至其他國家，對香港的港口及航運業帶來挑戰。

另一方面，香港航運中心在航運金融、船舶管理、海事保險、航運經紀和供應鏈組織等方面軟實力突出。2025年新華一波羅的海國際航運中心發展指數中，香港連續六年位居全球第四，僅次於新加坡、倫敦和上海，說明香港在全球航運服務體系中具有重要地位。香港海運服務業仍展現出較強韌性，成為推動香港國際航運中心功能升級的重要增長點。截至2024年底，香港註冊船舶總註冊噸位達1.318億噸，處於近10年來高位，並繼續位列全球第四，僅次於利比里亞、巴拿馬和馬紹爾群島。

航空方面，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功能也在加快發展。香港國際機場2025年客運量達6100萬人次，同比增長15%；飛機起降量達394730架次，同比增長8.7%；貨運量達507萬噸，同比增長2.7%。2024年，香港國際機場預計在未來約10年內達到處理1.2億人次年客運量及1000萬公噸年貨運量的目標。

下一步，香港可進一步推動海港、空港、航運金融、海事法律、保險仲裁、綠色燃料、智慧物流和高端供應鏈服務協同發展，把運輸節點優勢轉化為供應鏈管理優勢，把航運航空基礎優勢轉化為高增值服務優勢，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組中鞏固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

三、進一步鞏固提升國際貿易優勢，賦能「轉口貿易中心」，構建「高增值貿易服務和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

國際貿易是香港長期形成的傳統優勢，也是香港聯通內地與世界的重要功能。香港曾長期作為內地對外貿易的重要中介，在轉口貿易、離岸貿易、國際採購和供應鏈組織等方面積累了深厚基礎。隨着內地直接對外貿易能力不斷增強，香港傳統轉口中介功能相

對下降，但從最新情況看，香港貿易功能正在發生結構性轉換，國際貿易優勢仍具韌性。根據2026年4月世界貿易組織發布的《全球貿易展望與統計》報告，2025年香港商品貿易總額按年上升17.5%至15860億美元，佔全球商品貿易總額約3%，躋身全球第五大商品貿易經濟體。服務貿易方面，2025年全年服務輸出及服務輸入同比分別錄得6.3%和4.1%的實質增幅。受惠於訪港旅遊業恢復、跨境金融活動活躍以及運輸、專業服務等領域回暖，服務貿易成為支撐香港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因此，鞏固提升香港國際貿易優勢，不是簡單回到過去的轉口模式，而是在轉口貿易基礎上賦予新的功能內涵。特別是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加速重組、內地企業加快出海的前景下，香港可發揮國際化、市場化、法治化優勢，為企業提供貿易融資、離岸結算、匯率避險、信用保險、法律合規、國際仲裁、海外渠道拓展等一攬子服務，提升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和配置全球資源的能力。

值得關注的是，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是香港國際貿易中心轉型升級的重要突破口。2025年施政報告提出，支持業界設立更多經倫敦金屬交易所批准的交割倉庫，推出大宗商品貿易商稅務優惠，運用電子提單、代幣化存款等金融創新提升貿易流程，並深化與廣州期貨交易所等內地市場連接。發揮香港自由港、普通法、國際金融、離岸人民幣、航運保險、專業服務和倫敦金屬交易所等多重優勢，以及背靠國家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香港搶抓機會在黃金、有色金屬、綠色金融等領域的規則制定權和定價權，有利於香港為自身尋找新的增長點。

四、進一步鞏固提升專業服務和旅遊業優勢，依託「硬通道」，強化「軟實力」，鍛造綜合競爭力

香港不僅擁有金融、貿易、航運、航空等聯通世界的「硬通道」，也長期積累了專業服務和服務業等「軟實力」。香港專業服務業的優勢，主要體現在制度可信、規則成熟、人才集聚和國際網絡深厚。依託普通法制度、國際化營商環境、自由開放的市場體系和成熟監管規則，香港在法律、仲裁、會計、諮詢、檢測認證、知識產權、建築設計、風險管理等領域形成較強國際競爭力，能夠為跨境投資、國際貿易、企業融資、併購重組、知識產權交易和爭議解決提供高

水平服務。下一步，香港可着力把專業服務優勢轉化為服務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功能平台，圍繞內地企業「出海」、共建「一帶一路」、大灣區規則銜接等重點方向，提供面向企業國際化經營的綜合服務方案。特別是支持香港專業機構更多參與內地企業海外投資、併購重組、上市融資、跨境合規和爭議解決全過程，打造「香港專業服務+內地產業企業+國際市場網絡」的服務模式，使香港成為內地企業提升國際經營能力、防範海外風險的重要支撐平台。

旅遊業同樣可以放在「軟實力」的框架下重新理解。旅遊不僅是消費產業，也是展示城市形象、傳播中華文化、連接國際人脈、帶動會展零售和服務貿易的重要平台。

香港特區第六屆政府連續兩份施政報告，均對推動文化、體育和旅遊協同發展着墨頗多：2024年提出主動吸引不同盛事在港舉行，既重質亦重量，以盛事活動帶動零售和酒店業；2025年進一步強調「盛事+旅遊」概念，推動文化、體育、演藝、會展和旅遊深度融合。美國音樂產業權威雜誌《Pollstar》最新報告顯示，啟德體育園至今舉辦逾90場本地和國際活動，累計出售門票125萬張，總收入超過1.91億美元，兩項指標均在亞洲稱冠。在「2025年全球百大觀光城市指數」中，香港國際旅客到訪量位列全球第二，也反映出香港作為國際旅遊目的地的吸引力正在提升。未來要進一步推動啟德體育園、維港兩岸、老城街區、非遺文化、國際會展、美食消費等資源串珠成鏈，形成更多具有香港辨識度和國際吸引力的旅遊場景。通過提升停留時間、消費層次和城市體驗，把香港旅遊優勢進一步轉化為國際傳播能力、城市品牌能力和綜合競爭力。

展望「十五五」，香港做好鞏固提升傳統優勢這篇文章，關鍵在於把既有優勢放到國家發展全局和全球競爭格局中重新謀劃。只要香港繼續發揮「一國兩制」制度優勢，用好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地位，把國家所需、香港所長、國際所趨更好結合起來，推動傳統優勢從「有地位」向「有功能」、從「有通道」向「有生態」提升，就一定能在由治及興新階段開拓更大發展空間。

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港澳及區域發展研究所執行所長